

豪车“素质”拷问财富品质

赵志疆



今日论语

最近,“豪车”新闻“轧闹猛”,令人感慨良多。6月12日,浙江台州交警拦下一辆有7次交通违法记录的保时捷轿车,一协警坐进副驾驶室,要求司机把车开到路边。司机突然脚踏油门狂奔15公里才被截住。关于“挟警”原因,司机竟称要到火车站接人。12日晚,郑州一女子携带一男驾红色法拉利跑车在商务内环“飙车”,被交警拦下后,车上男子抢夺记者采访机并致记者受伤,面对交警处罚,男子叫嚣“我家有十几辆跑车随便扣”。

揆诸报端,在一片“有钱没文化”的质疑声中,总有“豪车”车主挺

身而出“拉仇恨”。人有高矮胖瘦,车分“豪华”“入门”,“豪车”遭恨,关键是一些“豪车”车主“睥睨天下”的“豪气”和“有钱任性”的跋扈劲。

“要到火车站接人”就可以“挟持”协警,这样的无法无天之举令人哑然失笑。急着去接人难道就可以视法律如无物吗?多达7次的交通违法记录,难道都是因为“急着去接人”?交警现场执法,尚且如此有恃无恐,寻常开车时又会是一副怎样的做派?至于“我家有十几辆跑车随便扣”,更是让人无力吐槽——浅薄狂言加上粗鲁举止,除了狂妄无知,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。

盘点各种“豪车”车主的癫狂行径,无不闪烁着对金钱赤裸裸的崇拜。在有些人眼中,汽车已不仅

是交通工具,更多的是一枚财富标签,于是,不仅买车要尽可能豪华,而且要尽可能多地“广而告之”,一朝“豪车”在握,仿佛就能肆意碾压法律条款与公序良俗。面对此类闹剧,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毋庸赘言,除此之外,更应探究的是,“有钱任性”这种思维惯性是如何产生的?

不可否认,社会对财富的适度尊崇是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动力,但是,如果这种尊崇超越了道义的底线与法律的藩篱,无疑将对社会和谐构成极大杀伤力——缺乏财富品质的有钱人,自恃用钱可以摆平所有问题;仍在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,则不免因此感到受伤。

同样是6月12日,还有一条

新闻令人感到温馨——山东淄博一辆英菲尼迪轿车正常行驶途中,看到一名环卫工推着三轮车走来,司机赶紧减速停下,没想到还是被刮伤车身,考虑到环卫工的收入情况,车主最终放弃了索赔。实际上,在“任性豪车”不断冲击人们眼球的同时,类似的“有爱豪车”亦不在少数。同属“豪车”,“任性”与“有爱”之间,最大的差别也许就在于“财富品质”。财富没有过错,“豪车”也没有原罪,很多时候,因“豪车”而起的纷争,不过是畸形财富观割裂社会的一个缩影。倡导汽车文明的同时,培育“财富品质”是个无法回避的内容,财富多一分平和与谦恭,公众自会多一分理解与尊敬。

道德模范评选不该有“刻板成见”

日报观点

已经去世的歌手姚贝娜,被评为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广东省候选人。简介中,姚贝娜热衷公益的一面得到描述;她担任“粉红丝带乳腺健康粉皮书”宣传大使、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抗癌宣传健康公益大使、“爱的小桔灯·儿童关爱行动”爱心大使。她先后参加多个慈善公益活动。不幸病逝后,她的眼角膜捐献给了多位受捐者。

生前的明星身份,让姚贝娜候选的消息再次引发关注,引起争议。

明星成为道德模范会降低感召力?这是一种道德过敏。明星也有很多面,他们也是普通人,也可以有较高的道德标准,也可以成为道德领域的模范。姚贝娜就是这样的明星。当她以明星身份参与社会慈善时,她是一个被围观的明星,也是一个践行慈善的普通人。我们会看到她的明星光彩,但也应该看到她行善的热诚。只要事迹真实,就不该让明星身份成为道德评价的障碍。

对于道德模范的评选和评价,我们通常会有一种刻板成见:道德模范一定是平凡的人干出了不平凡的事。如此,才能产生一种冲突张力

和反差效果。只是生活并非戏剧,人们想看到的是生活的全部,而不是某个时刻的惊呼一瞥:所谓的道德模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,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,是什么道德因子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?这才是人们所关注的,也是他们可以去学习的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姚贝娜成为道德模范候选人反而是一件好事,在迎来争议的同时,也在打破关于道德模范的“刻板成见”——在道德模范的评价中,需要表彰是精神和力量,至于表彰对象的面孔是怎样的,不应该有刻板成见。(李劲强 刊今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报有删节)

不许给差评？

「淘宝网购买商品,看来看去不称心。给个差评卖家恼,飞来威胁不安宁。」因为在淘宝上给了店家一个差评和中评,武汉市民陈先生被卖家骚扰了近一个月。卖家从深圳乘飞机到武汉,称不删评论就暴露陈先生个人信息,还向派出所报警称陈先生敲诈。

孺子牛画

网视輿情

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身亡悲剧的原因是什么?围绕这一问题,过去几天媒体做出了大量的努力,起初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结论是经济贫困,这样的结论符合人们的思维惯性。似乎只要提到农村的自杀事件,结论就可往经济状况上靠,至于个体心态这类因素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。

此后当地政府部门推翻了这一结论,不久一篇题为《毕节服毒四兄妹的人生末路》的深度报道引发关注,它以《四兄妹服毒自杀调查:孤独杀死了他们,与贫困无关》的标题在朋友圈受到广泛传播。但这个看似新颖的结论也经不起考验,质疑很快出现,大家感慨为什么都急于下结论。

其实不仅是媒体在追求效率,自媒体上大家同样试图依靠一己之

留守儿童为何走向人生末路

何小手

甚少,公益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徒有虚名,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极为有限。

任何草率的归因都显得没有说服力,任何试图力挽狂澜的个体都显得微不足道。对于“贫困论”,有人试图在其基础上做出修正,认为悲剧虽然并非由贫困直接导致,但大的根源其实还在于贫困,因为事发家庭的家长是出于改善家庭的目的而外出务工。这是留守儿童现象背后普遍的逻辑,父母只有通过走出去才能让家庭“后富起来”,如果考虑到这层背景,质疑他们为何不回故乡抚养孩子,无异于“何不食肉糜”。致富与养育子女成为矛盾的两面,两者孰轻孰重,要做选择恐怕并

不容易,在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选择,或许才是悲剧的根源。

上述分析视角相对广阔,它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。从外界的角度看,对贫穷个体的救助是相对容易的,可一旦悲剧根源不是贫困,或者说,这种贫困是由社会结构性因素导致的,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。公益行动在扶贫方面往往大有作为,如今面对留守儿童,这一群体迫切需要的恐怕是“精神扶贫”,公益人可能难有作为。有人说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时代悲剧,这看似有将问题抽象化、扩大化的嫌疑,但它或许也更能解释,为什么舆论面对此次悲剧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无力感。

新民新语

宁可信其有?

郝晶陶

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,是为古训。对于无法分辨真假的信息,对于不能确认是否存在的事物,姑且相信它是真的、是存在的——这样的选择,当然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态度,但就像有人说的,作为行为指南,却有一定的合理性。比如在野外看到一个蘑菇,不知道它有毒没毒,最好的办法是不去吃它,至少不会被毒死。

人们为什么会“宁可信其有”?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,潜在的损失更能影响人的决策。在一项“如何鼓励女性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”的研究中,向女性强调不进行检查可能带来的损失,比强调预防乳腺癌可能得到的收益,更能让女性行动起来,进行自我检查。同理,如果认为“信其无”可能带来损失,人们就会“宁可信其有”。

然而,许多谣言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,明示暗示“不相信我你就要吃大亏了哦”,让人对其深信不疑——即便有所怀疑,甚至正确的信息已经摆在面前,也会认为“小心一点总没有坏处”。辟谣之艰难,往往源于此。比如,流传已久的“迷魂药”谣言,虽有果壳网、@江宁公安在线等科普网站、警方官微多次辟谣,但仍然“生命力”顽强。在地铁、公交等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公共场所,吸入性麻醉剂不可能达到足够的浓度,更不要说拍一下肩、吹一口气就把人迷晕了(当然,口服的迷药是存在的)。如此反复的辟谣、科普,拂去了许多人眼前的迷雾,但必然还有人“宁可信其有”。

如果说有些“宁可信其有”具备合理性,有些虽不理性,但不会让人有大的损失,顶多因为不必要的谨慎付出一点社交成本,那还有一些,就可能被无良商家利用来发财了。比如,一些普通保健品的“疗效”被吹得神乎其神,一些食品的“抗癌效果”被无限夸大,无非是利用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,这些东西吃下去虽然没多大坏处,但也不值得人们付出那么多金钱。“宁可信其有”,原本是为了免遭损失,如果反而因此受损,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。